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

总主编 顾海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研究

主 编 冯天瑜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

总主编 顾海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研究

主 编 冯天瑜

副主编 赵世举

朱志方

单 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冯天瑜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顾海良总主编

ISBN 978-7-307-06599-4

I. 中… II. 冯… III.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理论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336 号

责任编辑:陶洪蕴 卢伟

责任校对:王建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3 字数: 473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599-4/G · 1244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编委会

顾 问 韩德培 谭崇台 马克昌 彭斐章 陶德麟 李 龙

冯天瑜 刘纲纪 宗福邦

主 任 顾海良

副主任 骆郁廷 黄 进

委 员 (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传夫 陈 伟 陈继勇 陈庆辉 程斯辉 邓大松

杜青钢 郭熙保 胡焰初 胡勇华 简新华 李 光

罗以澄 马费成 彭元杰 彭万荣 余双好 沈壮海

王树义 肖永平 余敏友 张建清 张金海 赵世举

朱炳祥 朱志方

秘书长 郭明磊 谭玉敏

写在前面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三十年来，神州大地春雷声振，百业欣然；华夏儿女历经风雨，谱出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

三十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织就学术繁荣的瑰奇彩图，有力地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

三十年来，武汉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铿锵步伐，秉承优秀学术传统，学科日强，人才辈出，新论屡见，佳作迭现，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的重要一域。

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武汉大学隆重举办“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跨学科论坛”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坛”，汇集全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力量，全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创新图强的伟大历程，深刻研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科学探索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前景。

全校师生以高涨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责任感参与了这些大型的学术活动。论坛组委会收到专文凡 200 余篇。我们撷英集萃，编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一套五册，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研究》，以记其盛，以飨读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编委会

2008年9月26日

目 录

多层次变革的交会·····	冯天瑜(1)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朱志方(16)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方位·根本·新领域·····	沈壮海(27)
三十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傅才武 陈 庚(41)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处境与指归·····	陈立新(57)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彭国亮(70)
从“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	李 志(82)
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反思·····	赵士发(9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价值观的转向·····	张传有(106)
中国哲学史研究三十年·····	秦 平 郭齐勇(118)
传统“信任”思想的当代意义·····	吴根友(130)
当代中国三次宗教哲学争论·····	段德智(141)
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周玄毅(155)
三十年来中国审美文化的嬗变·····	邹元江 刘建平(166)
中国文化心理研究三十年·····	钟 年 程爱丽 汤 平(180)
从语言问题到语言资源:语言观的深刻 变革·····	冯学锋 赫 琳(194)
思想解放与汉语语法研究的繁荣和 创新·····	赵世举 邱庆山 许艳平(206)
文艺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多元·····	唐铁惠(222)
古代文论三十年:转型与新变·····	高文强(231)

近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	曹建国(241)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土文献学·····	肖圣中 阮桂君(252)
中国比较文学视阈的拓展·····	赵小琪 赵 坤(263)
海外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城市形象的变迁·····	涂险峰 余婉卉(280)
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	杜青铜(291)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翻译研究·····	刘军平(302)
英美文学译介与研究三十年·····	朱宾忠 任晓晋(313)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艺术概览·····	彭万荣 王文斌(326)
三十年来中国电影巡礼·····	黄献文(338)
中国近代史学科三十年发展感言·····	李少军(349)
经学史研究的复兴·····	杨 华(360)
中国礼仪文化的复兴·····	李荣建(374)
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 ·····	罗运环 张 丹 吴国恒 杨山坡(385)
宋代妇女史研究三十年·····	杨 果(402)
简帛数学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三十年·····	晏昌贵(415)
从语义学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余来明(426)
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闻观念的变革·····	秦志希 路俊卫(439)
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	单 波(450)
中国大陆报纸种群演进的逻辑分析·····	罗以澄 吕尚彬(462)
中国报纸视觉传播理念的嬗变·····	石义彬 曾玉梅(476)
我国报纸发行三十年:变革与趋势 ·····	强月新 余建清(489)
中国广告产业发展三十年的制度检视·····	张金海(500)
改革开放与我校留学生教育事业的 发展·····	彭元杰 翟 汛 程乐乐(512)

多层次变革的交会

冯天瑜*

如何估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文化的走势，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宜笼统论之，需要从时、空两个角度加以剖析。

一、多重变革的叠加

自 19 世纪中叶中国闭锁的国门打开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处在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之中，面临一个“古今更革”的大题目。敏感的梁启超 1901 年在《过渡时代》一文中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百余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此种“过渡”状态，在改良与革命、战争与建设相交替的复杂而悲壮的进程中，经历了对欧美模式、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扬弃，锲而不舍地探寻着前行之径。1978 年以来的三十年，在世界信息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潮的时代氛围里，中国抓住机遇，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展开变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把清中叶以来起伏跌宕的文化转型推向高潮，其运行速度之迅猛，包含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难觅先例，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罕见其匹。

近三十年来的文化转型，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课题都挨肩擦背地竞相在三十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资深教授。

年间演出。简言之，包含三个层级的变革的交叉互叠：

（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

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程度在50%~60%，故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还要继续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未竟之业。时至2005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6%，世界排名56位，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称半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①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今后三四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路，作为一种“动员式体制”，曾取得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苏联模式”（中国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模仿此种模式）加以扬弃，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是近三十年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

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

^①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取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呈现在当今中国面前，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便是得之于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2005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0%，世界排名51位，与同年美国的109%、日本的102%、德国的93%、法国的92%、英国的91%尚存颇大差距。^①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

因此，近三十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今转换，其面对的，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而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深刻。例如，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如开掘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而且还要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

以工业文明为基石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就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而论，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环境破坏。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进展，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单单依凭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是不够的，而要更深入发掘元典关于协调阴与阳、柔与刚、利与义等对立统一

^①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269页。

关系的富于睿智的精义，并在实践中探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偕时而进、不断深化的进程。

正确认识传统思想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必须克服直线进化史观带来的蔽障。综观人类文化的进程便会发现，文化的演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一个螺旋圈层内部，作为终结的第三阶段（“合”）综合着前两个阶段（“正题”与“反题”），履行着在新的更富有内容的统一中扬弃其片面性的功能。宗教改革对希伯来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对先秦两汉的复归、思想上对原始儒学的复归，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对先秦诸子的复归和对三代之制的崇拜，均为例证，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元典精神则进行了又一次复归，更为显例。今日的思想界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正对元典精神酝酿着新的创造性复归。这是我们考察传统思想现代转化时应予关注的一个方面。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两极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蕴的内容极其丰富，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伏尔泰（1694—1778）、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对中国的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等东方式智慧大加赞叹，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另一极则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他们透见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黑格尔还把“东亚智慧”的化身孔子视作“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①。时至近三十年，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19页。

西方人对东亚智慧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现代东亚人自身对东亚智慧的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亚智慧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亚智慧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东亚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智慧的褒贬扬抑，往往发生巨大反差。如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智慧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重要领袖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①。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②

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

①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载《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1-124页。

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①

总之，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勱（1887—1969）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描述了这一情形：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援我们。”^②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唯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弯，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6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页。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①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东亚智慧救国论”，而且是“东亚智慧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东亚智慧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就梁氏个人的心路历程作具体分析，而只能简要考察梁氏十余年间对东亚智慧评价系统的变化，进而探求梁氏关于东亚智慧的两种极端之论给我们提供的教训。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传统东亚文化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谋求现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现。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东亚社会及文化未能导引出现代化，而且其若干层面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发所揭露的东亚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读来，人们也能产生会心之感。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观东方，发现东亚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东亚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析，不免失之天真，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

人们往往因梁启超1904年至1920年间的思想大转变而嘲讽他的“多变”，梁氏自己也曾以此类行径自嘲。但是，我们今天的认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页。

识不能停留于对梁氏跳跃式思维的一般性批评，而应当进一步考析：这种“大转变”、“大跳跃”报告着怎样的文化消息？今天的人们应当从这种文化消息中获得什么启示？

简言之，1904年梁氏批评东亚社会及文化，其出发点是“现代化的诉求”；1920年梁氏呼唤以东亚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现代文明，其出发点则是“后现代的探索”。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世界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欠发展”的中国及东亚世界，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而西方世界已经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却通过种种渠道纷至沓来，陈列于东亚人（特别是东亚文化人）面前。这样，东亚人（特别是东亚文化人）一方面要扬弃东亚智慧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性”。梁启超的前后矛盾表现，其内在原因在于，他没有对东亚智慧在历史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功能加以必要的分疏和厘清。这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缺憾，也是那一时期以及此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人们共同的认识误区。

我们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当然不应重蹈先辈的故辙，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的两极间摆动，而理当历史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特质，既肯认东亚智慧创造辉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实，又研讨东亚智慧未能导引出现代文明的因由，还要深思东亚智慧对疗治现代病的启示意义。在展开这些思考时，应当把握历史向度，而不能作超时空的漫议，同时还必须真切把握西方智慧这一参照系，克服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和心醉西风的西化主义两种偏颇。总之，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各种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三、对现代文明而言，传统提供的是暗喻，而并非现成方案

论及“东亚智慧疗治现代病”这一题旨时，有一要义不可忽略——东亚智慧作为古典整体思维的产物，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某种启示（正因为是“潜藏”，故有待今人去“开掘”、“阐扬”），而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和操作手段，因为在东亚智慧的发展历史上，并未创建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全面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层面为例，东亚智慧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依正不二”等观念，对于现代人克服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是富于启迪意味的。然而，“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依正不二”等观念其原始义是讲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并不是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依正不二”固然洋溢着综合的、生机主义的智慧，但在这类理念诞生并流传的东亚世界，因理念本身的弱点和工具理性不发达，并没有普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实际情况却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其基本原因是人们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有意无意地损伤自然、破坏环境。农耕文明持续几千年，并且长期处在对自然的盲目开发状态中，因而农耕文明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其程度是不应低估的。以中国的黄河流域为例，其在三四千年前曾经是森林繁茂，麋鹿成群，气候温润的地带，正如《诗经》所描绘的黄河支流渭水流域一带“周原膴膴，萁茶如飴”，但经过数千年破坏性的农业垦殖，使黄河流域变得童山兀兀，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整个黄河的中下段已成河床高于两岸地平面的“悬河”，夏季常常出现长达数十天甚至百余天的断流。又如中美洲曾经在8世纪前后几百年间繁荣一时的玛雅文明，后来戛然中绝，其原因之一便是玛雅人的无限制垦殖，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加之玛雅人好战嗜杀，终于致使这一文明在13世纪前后灭亡，“只在大雨连年的尤卡坦森林里留